

多维视角下的西方哲学

黄颂杰先生 从教 55 周年 师生文集

汪行福 朱晓红 王新生 余碧平 编

上海三联书店

多维视角下的西方哲学

黄颂杰先生从教 **55** 周年师生文集

汪行福 朱晓红 王新生 余碧平 编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维视角下的西方哲学:黄颂杰先生从教五十五周年师生文集/汪行福等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10

ISBN 978-7-5426-6097-8

I. ①多… II. ①汪… III. ①西方哲学—文集
IV. ①B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1879 号

多维视角下的西方哲学——黄颂杰先生从教五十五周年师生文集

编 者 / 汪行福 朱晓红 王新生 余碧平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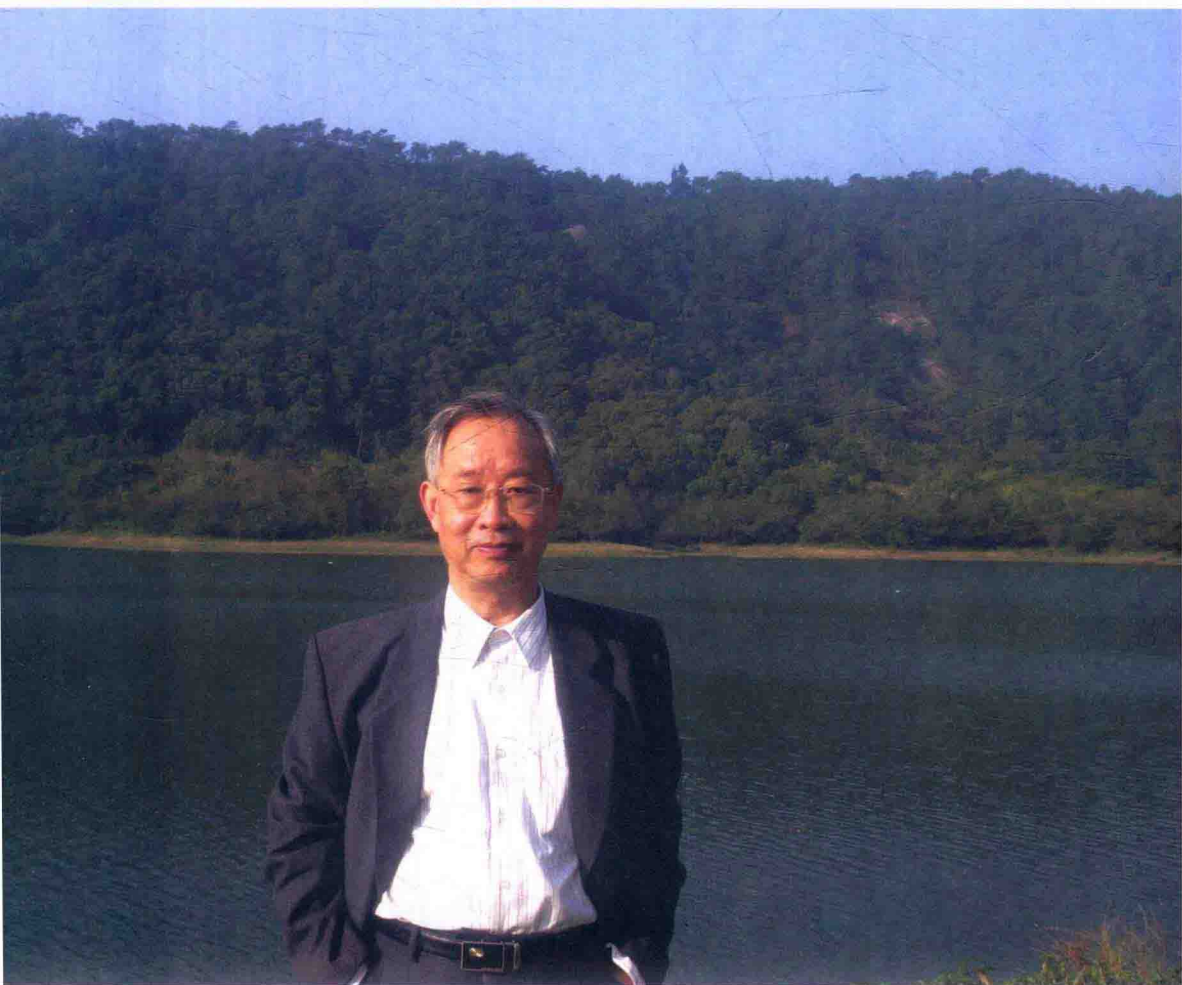
字 数 / 400 千字

印 张 / 30

书 号 / ISBN 978-7-5426-6097-8/B·544

定 价 / 9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黄颂杰教授

CONTENTS

目
录

黄颂杰 严谨治学问 悉心育学生——忆恩师全增嘏先生 / 1

第一编

- 黄颂杰 哲学要素论和哲学前景论：走向实践哲学 / 11
- 张庆熊 评黄颂杰对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研究 / 20
- 汪帮琼 论赫拉克利特哲学和巴门尼德哲学的内在关系 / 25
- 吴树博 论“比较”在斯宾诺莎哲学中的意义 / 37
- 张小勇 维柯的新英雄主义：堕落时代的大学教育理念 / 48
- 李学生 论休谟反形而上学思想 / 56
- 王建军 康德与西方形而上学的命运 / 68
- 赵晓芳 康德性别正义论的双重根据 / 88
- 汪行福 双重视角下的黑格尔哲学 / 101
- 邓安庆 从“自然伦理”的解体到伦理共同体的重建 / 129
- 徐长福 黑格尔 Subjekt 概念的两个维度与三层含义 / 151
- 孙玉良 试论狄尔泰历史解释学基本原则 / 165
- 吴新文 哲学的危机与尼采的哲学革命 / 177
- 吕 翔 重新理解主、客体及其辩证关系 / 193
- 朱连增 非意向性与核心自我 / 206
- 余永林 古典灵魂论简评 / 218
- 胡传顺 自识、辩证法与实践智慧——伽达默尔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释义学研究 / 227

- 王礼平 超越还是内在? 论列维纳斯与柏格森之间的差异以及殊途同归 / 237
- 余碧平 论保尔·利科的“确信”概念 / 259
- 陈联营 阿伦特论康德的思辨理性概念 / 269
- 陈华兴 论安东尼·吉登斯的生态政治观 / 282
- 王春梅 李世平 “他律道德”是否合法? / 295
- 李虎 道德哲学若干基础概念的复杂性 / 303
- 宋宽锋 研究西方哲学的诸种方式及意义 / 314

第二编

- 黄颂杰 论西方哲学的宗教和神学之品性 / 325
- 刘光顺 西方哲学的神学品性——黄颂杰老师关于西方哲学和宗教关系的论述 / 336
- 寇爱林 基督教：两希文化的“道成肉身” / 349
- 林庆华 简论托马斯·阿奎那的财产权学说 / 360
- 刘芳 上帝·世界·人——透析哥德曼悲剧观的生存论意义 / 368
- 潘明德 索洛维约夫的“一切统一”概念及其当代意义 / 380
- 朱彦明 后现代哲学的“宗教转向” / 390
- 朱晓红 德日进的“宇宙性基督” / 407
- 徐卫翔 从歌剧《茶花女》看西方艺术的宗教维度 / 422
- 王新生 后蒙昧时期阿拉伯圣俗秩序的解构与重构 / 435
- 季桂保 吴新文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教师——黄颂杰教授访谈 / 454

作者简介 / 468

后记 / 474

严谨治学问 悉心育学生 ——忆恩师全增嘏先生

黄颂杰

学贯中西

全增嘏先生生于1904年，原籍浙江绍兴，但自幼随做官的祖辈和父辈生活在贵州、上海等地，所以说说话没有一点浙江乡音，完全是云贵一带的口音。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是清代大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的后裔。由于家学渊源，他从小就熟读经书典籍，具有非常厚实的国学功底。同时，他又接触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和文化。他13岁进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在那里学会了一口流利英语。中学和西学、仁义礼智和科学民主同时进入他的心灵。1923年至1927年他留学美国，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哲学。深受当时在美国盛行的新实在论哲学思想的影响。留美回国后在上海各大学任教。1942年起任复旦外文系教授，并任系主任，同时任复旦图书馆馆长。1955—1956年哲学系创建时，他从外文系转到哲学系，担任逻辑学和外国哲学史两个学科的教授和教研室主任。他是我国建立学位制度以来全国第一批、复旦哲学系第一位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教授，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和声望是很高的。无论从学术思想还是从生活方式来看，他都是20世纪中国知识界中中西教育和中西学术文化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学术研究要贯通中西、贯通古今是那个时代我国知识精英自然形成的理念或追求。全增嘏先生留在我头脑中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贯通中西的学养异常深厚，非同一般。

公众一般认为全增嘏先生是位西方哲学专家，其实他对中国学术经典的

研读并不亚于对西方哲学经典的研读。全增嘏是名副其实的学贯中西的学者。他在指导我们学习西方哲学时,常常引导我们注意学习中国哲学。我曾注意到,他关于中国学术文化的藏书量远超过西方学术文化的藏书量。他的书桌案头、沙发椅子上,少不了随时阅读的中国古代典籍,去他家时第一眼看到的常常是他手中的古书,这大概是他从幼年时代起就养成的“手不释卷”的习惯。上世纪30年代全增嘏在上海各大学任教的同时,还兼任当时中国最具国际影响的二份英文学术期刊《中国评论周刊》和《天下月刊》的英文编辑。编辑部周围聚集了当时中国的大批学术文化精英,而且很多是留学欧美名校的回国青年才俊。他们不同于五四时期知识界激烈反传统的态度,注重在民族历史特性基础上的文化再造。在日本侵华紧逼的形势下,中日关系日显突出,抗日成为这二份英文期刊的主导思想。《周报》的时政性更强烈,《月刊》则更重文化语境,着力于向国外介绍传播中国文化,包括传统的和现代的。全增嘏和林语堂从30年代后期起致力于办《月刊》,1938年随编辑部迁至香港,直至1941年香港沦陷,全增嘏回重庆。他们不仅是期刊的编辑,也是主要的撰稿人。全增嘏在此期间写下了大批诠释中国文化的文章。1938年起,《天下月刊》在香港发行,国内学者所知甚少,但对海外学者很有影响,有些读过全先生当年英文文章的港台学者现在还对全先生非常尊敬,不过这样的学者现在已经很少了。贯通中西不仅是求知治学问的事,同时也应该是我国建设现代化事业中付诸实践的事。西方的现代化走在我们前面,确实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东西,但必须与我国历史的和现实的实际相结合才能行之有效,这里面也有个“贯通中西”的问题。

贯通古今

全增嘏教授在学术思想上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看法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地自由地展现出来。从方法论上看他奉行客观主义,强调哲学思想、哲学史的客观性。他在上世纪30年代初写过一本《西洋哲学小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恐怕是最早出版的由我国学者撰写的西方哲学史著作之一,它简明扼要,言简意赅。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书中倡导,学哲学是要我们受智慧的指导,不要被偏见和权威所支配,哲学的功用在于解放思想,改变人类好作武断的怪癖,保持人类的好奇心,使人类努力求知,以尽人的天职。受这

种思想指导,全先生一直主张应当把哲学研究的范围理解得宽泛些,除了宇宙论、知识论,还应包括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法律哲学、文化哲学等等。这个主张是合乎 20 世纪初以来现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的,也与中国哲学的实际相符合。这与他上世纪 20 年代留学美国攻读哲学而同时又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有关,他贯通中西,也主张贯通古今。

对于从古到今的哲学发展史,全先生从不偏废哪一段。他重视古希腊哲学,认为那是西方哲学的根,不懂古希腊哲学,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将会是肤浅的。他非常喜爱读柏拉图的对话,收集了许多版本的柏拉图对话的英译本注释本和研究柏拉图哲学的专著,供我们研读。上世纪 60 年代初,全先生对当时西方关于古希腊哲学研究情况非常了解,要我们阅读许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指定要我们读的康福德(Conford)关于柏拉图对话的详情的注释-评析本。至今我还保存着阅读时所做的札记。为了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学得实在,他特地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徐怀启教授讲解亚氏的经典《形而上学》。徐先生精通古希腊文、拉丁文,是基督教神学-哲学家,他将《形而上学》的古希腊文本、拉丁文本和英文本相互对照,逐字逐句仔仔细细地进行解读。(其实全先生也懂古希腊文)从此徐先生成了复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常客,他与全先生和其他教师结下了友谊。1964/1965 年,根据毛主席关于加强国际问题和世界三大宗教研究的批示,复旦哲学系聘请徐怀启教授开设“基督教史”课程,我曾根据他的讲课整理了一份书稿交给系里,可惜在“文革”中丢失了。就从那时起复旦哲学系开始了对宗教和宗教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这在全国也是起步最早的,记得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也是在 1964 年成立的,它的首任所长任继愈教授曾致信我系胡曲圆主任,希望能派遣外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去该所工作。

全增嘏教授对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视在 20 世纪老一辈中国哲学家中间是比较突出的。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他就打算写一本书,专讲现代西方哲学,由于抗战爆发而未能如愿。但他在篇幅不大的《西洋哲学小史》中就专列一章,从科学飞速发展引起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这个视角讲述现代西方哲学,这是符合 20 世纪初叶西方哲学的状况的。上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全先生曾深入钻研罗素、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及存在主义,并发表有深度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刊登在《复旦学报》和《学术月刊》上。1961 年春,他给我们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一门名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新课,系统讲述现代

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和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在当时的高校这是绝无仅有的“首创”。那时我国的西方哲学教学和研究一般都止于黑格尔哲学,后黑格尔哲学统统都被看作腐朽没落反动的反面教材,从政治上说这是一个“禁区”,而从学术上说也是荆棘丛生,因为要将黑格尔之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加以梳理,进行评论,使之系统化为一门学科,实在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然而这一个多世纪正是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时段,是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激变动荡的历史时期,了解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70年代末哲学系成立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80年代初以刘放桐教授领衔编著的《现代西方哲学》和以全增嘏教授为主编的《西方哲学史》相继问世,在教育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成果的出现是人才的成长和西方哲学学科群体的形成,并且带动了全系的发展,全增嘏教授在这一学科建设中的开拓和奠基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

全增嘏教授治学的最大特点是严谨,认真,踏实。就教学而言,他讲课总是有准备得很充分的讲稿,无准备的课他是不会讲的,也不会课上随意引申发挥,但他也不是照本宣科,而着重于分析讲解,条理非常清晰,逻辑性特强,他声音响亮,口齿清楚,抑扬顿挫,只要认真听讲,大都能记下来,而且记下来的笔记几乎就像一篇文章。他讲课的内容非常实,有材料有观点,不随意加水分,不把意识形态的东西强加于人。抱着求知的心态听他讲课,你必定会有所得,会觉得很值得,时间过得很快,期盼下次课的到来。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讲授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课的时候,国内还没有系统像样的完整的教材,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国内高校还没有人讲过,课程内容特别是材料都来自国外文献资料,必须要有很高的英语水平,而且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分析批判,课程难度之高可想而知。

就科研而言,他总是反复思考、琢磨,还没有搞清楚的问题、观点,他是不会下笔的,他写的文章比讲课更严谨,逻辑性也更强,思路非常清晰,分析层层递进,深入浅出,把晦涩难懂的西方学说表达得好懂好理解。他告诉我们,写文章一定先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堆积大量自己也没有消化理解的材料,也不要装腔作势说空话。他的英语堪称一流,有很深的造诣很高的水平,我在学生

时代曾听说他是中国英语四大家之一。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著名黑人历史学家杜波依斯来复旦大学讲学访问,指名请他做翻译。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上海时,接待工作中的许多话语,诸如菜单等等,都请他过目审定。他做翻译非常严肃认真和谨慎。他和夫人中文系胡文淑教授共同翻译的英国大文豪狄更斯的《艰难时世》,称得上是翻译书籍中的楷模佳作。这是狄更斯小说中哲理最强也最难译的一本书,两人常常为求一字一句的最佳翻译而争得不可开交。“文革”的中后期全先生被安排到“自然科学哲学翻译组”,他和复旦物理系王福山教授等翻译了好几本高难度的名著,如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梅森的《科学史》等等,翻译这些书既要有很高的外语水平又要丰厚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70年代末他有次跟我谈起翻译方面的事,他说他译《科学史》前后看了20多遍,书出版后还感到不满意。现在我们往往因急于出版匆匆忙忙交稿,出版后除非某种需要否则也不会再去阅读,而全先生在书出版以后还总要再仔细校看。有一次我去他家,看到他在自己翻译出版的书上还作了好多修改。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现在是很少见了。复旦哲学系很多教师都知道,全先生不仅在哲学系而且在外文系也有很高的声誉,与我同辈或比我高一辈的外文系教师一谈到全增嘏,都肃然起敬。全先生满肚子的学问,可是他不动声色,不愿意流露,不喜欢张扬,功夫本领一般只用上几分,决不会全部使出来。他讨厌卖弄学问,炫耀自夸,也反对读书光求快而不求甚解,更反对不懂装懂。这是他那一辈许多学者的共同特点,不过在全先生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和典型。他们做学问是注重积累,循序渐进,厚积薄发,谨慎创新。作为学者,谁都希望发前人之所未发,说前人之所未说,而影响他们大胆创新的因素大而言之有两个。一是学理方面的,学问之大之深超过大海,因为海再大再深总是有限的,而学问则是无限的,一旦深入学问,就会感觉到自己的不足,而且越深入就越会有不足之感,不知不觉之中形成一些约束,就会有降低甚至丧失超越能力的危险;另一个则是政治方面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使许多学者尤其是文科学者小心翼翼,甚至战战兢兢,生怕失去政治生命。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的风尚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有了一点本领、能力,稍有积累,就急于表现,惟恐别人不知道,生怕巷子太深公众闻不到自己的酒香,动不动就标榜创新,“最”字头的名词形容词放肆滥用。学一点老一辈学者之所长,补一点我们今日之所短,恐怕还是很有必要的。

悉心培养弟子

让我终生难忘的是全增嘏教授对我们晚辈的悉心培养。60年代初我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休整期,高教部制订了高教六十条,旨在使高等教育走向正规化有序化,研究生制度是其中的重要方面。1962年即我们本科毕业的那一年,教育部正式实施研究生报考录取制度,我和姚介厚先生(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有幸成为全先生的研究生。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招收的西方哲学的研究生,他一扫平时那种严肃冷峻和寡言淡漠的神态,情绪高昂,心情愉快,满腔热情,大有一展宏图的架势。我还大致记得第一次上他家求教的情景。在简短谈了一些基本情况后,他随手拿起桌上的英文书,记得一本是斯泰士(Stace)的《批评的希腊哲学史》(*A Critical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一本是伯奈特(Bernet)的《早期希腊哲学》(*Early Greek Philosophy*),每人一本,要我们俩依次一边看一边译成中文念给他听。随后他选定罗杰斯(Rogers)的《学生哲学史》(*A Student's History of Philosophy*),要我们回去仔细阅读,以后每次上课辅导第一件事就是由他任选一段让我们译给他听。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大学生用的一本哲学教材,后来我们明白,他之所以选这本书是因为此书论述比较客观,更重要的是因为该书引用西方哲学经典原著特别多,常常是一段接着一段。全先生坚决主张,学西方哲学必须学会读原著和专著,刚起步读大部头原著有困难,从引用原著较多的教材读起可以逐步提高和深入。全先生在听我们读、译英语著作时非常认真仔细,听到译错或不准确之处,即时打断读纠正。全先生对我们研究生三年的学习培养计划制定得非常明确实在,并口述了具体详情的说明。他把西方哲学史分成古代、近代、现代三大段或三大专题,古代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主,全面学习古希腊罗马哲学;近代以康德、黑格尔为主,兼及笛卡儿、斯宾诺莎、休谟,全面学习经验论、唯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现代以罗素、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为主,全面了解现代各哲学流派。每一段的学习均以读经典原著为主。每个学期学一段,第四学期为机动,最后一年写毕业论文。他还规定,每两周去他家上课辅导,每个月交一篇文章或读书报告。在学习计划中他还规定了每个阶段的必读书目和参考书目。使我们感动的是,他常常准备了一大批图书让我们带回去学习,这些书有的是从图书馆借

的,有的是他自己收藏的。那时他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动态和图书资料情况很熟悉,而且知道在复旦、华师大、上图能借到哪些书,他或是自己设法借好,或开出书目让我们去借。从那时起,他家的起居室就成了我们的课堂,他夫人胡文淑先生毫无怨言,而且每次都热情招待我们,有次她对全先生开玩笑说:“你们这倒像是手工作坊,师傅带徒弟,精工细作啊!”全先生说:“就应该这样才学得好嘛!”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家起居室墙上挂的徐悲鸿的栩栩如生的骏马图,那只时而活蹦乱跳时而安静地躺在沙发上的小花猫。除了校内学习之外,他还带我们参加上海市哲学学会有关外国哲学的各种学术活动,最常去的地方是南昌路科学会堂。

我们的学习计划在第一学年实行得很顺利,很好,全先生非常满意,我们也感到实实在在学到了很多很多。每次我们总期盼着去他家汇报我们的学习,听他纠正我们的英文错误,听他对问题的解答,对各种哲学思想的解释,对自己观点的阐述、发挥,或者听他对我们的作业的评论。全先生是非常重视写作训练的,他批阅我们写的文章很仔细,除了口头评述,还在作业上写些简短的评语。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都发生过许多的动荡变迁,多次的搬家迁移,我丢弃了很多资料文书,但当年全先生为我们制定的研究生培养计划,我就学于全先生门下时候的读书札记以及全先生作辅导讲课时我所记下的笔记,我都保存着,有时还拿出来翻看。我们的学习计划在第二学年实行得虽不如第一年那样顺利,但大致还可以。由于学习内容扩展,加之政治活动又开始多起来,我们的计划不断往后推延。1964年以后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又开始逐步升温,中苏论战、四清运动、反修防修,等等。参加农村四清长达半年多,我们的学习计划被迫中断。第三学年撰写毕业论文,全先生原定要我们一个写古希腊方面的,一个写德国古典哲学方面的(在那时现代部分是难以写成毕业论文的,除非是批判式的),但政治形势迫使我们转而去写批判“苏修”的文章,作为毕业论文。也许是太热衷于专业,太投入了,全先生对政治形势的变化起初没太在意,但不久就意识到了,他的情绪开始下沉,神态又重新严峻起来,话也少了,对我们毕业论文的“转向”他保持沉默。1965年夏我们理应毕业,却被安排去搞“学术大批判”,后来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全先生的研究生教育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典型,不久他被关进了“牛棚”。事实上,像全增嘏教授这样悉心培养研究生的导师恐怕并不多见。他这样做并不关乎自身的名利,而是一种职责,一种施展自己才能或实现自身的机缘,他由此而获得的

愉悦是任何他人所不可能得到的,这是他从事哲学研究心情最佳想法最多的时期。遗憾的是这样的机缘对他(和他的同辈学者)而言实在是太少了,时间太短了,对我们学生而言无法把他(们)的功夫本领悉数学到。幸运的是我们在这难得的短暂的机遇中总算学到了一些对我们终身有用的东西,在我和姚介厚身上留下了永恒的烙印。全先生对研究生教育如此精心设计,认真负责,全身心地投入,在当时实属少见,在今天更值得学习和发扬。

70年代末起全增嘏先生致力于主编《西方哲学史》,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实,早在1960年,当时的高教部就邀请全先生整理西方哲学史讲稿并编写为通用教材,1966年“文革”前已完成初稿,遗憾的是在全先生遭冲击被抄家期间书稿全部遗失。80年代初起学术研究的形势和环境逐渐好转,可是,在经历了“文革”的劫难以后,此时的全先生又不断遭受病魔的侵害,常常显得心力交瘁,力不从心,他的夫人在“文革”期间去世无疑使他的身心和生活遭受重创。1984年他病重住院期间我曾去华东医院陪夜。夜深人静,坐在他的病床旁我凝视着他痛苦的脸庞,听他不断地反复地说梦话,声音惊恐,内容都是关于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中遭受的批判斗争。精神的创伤尚未治愈,对于身体的疾病就更难以制胜。未及把他积累深厚的学识充分发挥出来,全先生就回归了自然。

第一编

哲学要素论和哲学前景论： 走向实践哲学^①

黄颂杰

西方哲学的内涵其核心当然是本体论和知识论，我所谓的构成要素则是指神学、科学、逻辑和政治四个方面。我所要谈的并不是哲学与这四者作为独立学科之间的一般关系，而是从本体论和知识论的追求与这四者的内在相互关联之中来谈西方哲学的演化发展，以便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西方哲学并展示其前景。换句话说，要正确理解和把握西方哲学，就必须要从这四者切入进去或从这四种视角去加以考察，撇开这四者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把握西方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它称之为“要素”。这四者从西方哲学形成起就已存在，直至今日，当然这也是经历一个发展过程的。谈论这四要素不能停留在西方哲学的某一阶段上，而是贯穿于从古至今，因此我又称之为“西方哲学纵横谈”。

神学与科学

西方哲学是从原始宗教和神话之中脱颖而出的，但它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宗教和神学之品性。这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密切相关。

西方哲学起始于对宇宙万物“本原”（或译“始基”）的探求，即从纷繁复杂的自然世界出发，寻求万物生成变化的始源、起点，这意味着想要从个别、具体

^①【编者语】作者在长期从事西方哲学教学研究过程中，在许多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和多所大学的哲学讲演中一再提出，要全方位、多维度、多视角研究西方哲学。所谓“四要素”实即四个切入点，四要素综合成“形而上”与“形而下”两种张力，形成思辨（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之分。作者特别强调从思辨（理论）与实践、思辨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进路解读西方哲学。